

第五章

心靈富裕



養病清華園

梁從誡曾說：「母親愛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裡度過的。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九年的顛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裡那斷了線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躪，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牆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回到北平以後，梁思成到清華大學任建築系主任，他們把家也安置在美麗的清華園裡。梁家周圍的環境寧靜宜人，陽光充足，很適合居住，家裡有了彈簧床，浴室裡也有了冷熱水管，生活比從前方便多了，但由於正值抗戰勝利不久，通貨膨脹嚴重，經濟蕭條，物資匱乏，他們的生活仍然很艱苦。

對於林徽因來說，從南方返回北平，結束了抗戰時期的流亡生活，並沒有給她的身體帶來任何好轉的跡象。她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家中的床上。心情寂寞而又苦悶，只有朋友間的聚會讓她感到些許安慰，她形容：「家庭聚會已經從昆明移到了清華。」

不只是自己的病情讓她提不起精神來，時局也讓她感到分外擔心。抗戰勝利之後不久，林徽因就已經覺察到了抗戰之後的中國局勢並不寧靜，一場新的戰爭正在醞釀之中，她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说：「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閒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臥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

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盼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灼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如今，蔣介石對解放區的大肆進攻已經開始，無數中國人又被捲入慘烈的戰爭中。林徽因因為砲火之下慘死的人們而感到悲痛，也對中國的前景感到有些茫然，躺在病床上的她焦躁不安。

梁思成出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不久，又接到了赴美考察「戰後的美國建築教育」的任務，同時也收到了美國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函。耶魯大學邀請他作為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學年客座教授到紐黑文講授中國建築藝術，普林斯頓大學則希望他參加一九四七年四月「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討論會的領導工作。此外，一九四七年二月梁思成還被推薦為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於是梁思成便於一九四六年十月離開北平，前往美國。

由於梁思成的離開，清華大學新開辦建築系的許多工作，就暫時落到了林徽因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她幾乎就是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築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與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友誼，熱心地和他們在學術上進行真誠的交流和探討。同時，她也結交了復員後的北大、清華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同他們興致勃勃地在廣闊的學術領域進行交流。

由於獨自一人操勞家務，林徽因病情加重，感到非常苦悶，只有朋友來看望她時，才能帶來許多愉快。一九四七年夏天，在歐洲戰場上做戰地記者的蕭乾回到祖國，從上海趕到北平來看望當年的「小姐」林徽因。蕭乾帶來了許多歐洲戰場上的故事，和林徽因談了很久，這次會面讓林徽因感到很是愉快，躺在病

床上的她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這麼愉快的談話了。

不久，在上海的大表姐王孟瑜得知林徽因身患重病，一人在家操持，過得非常辛苦的情況，特地從上海來到北平看望她。林徽因小時候曾經和大表姐一起在上海和北京生活、讀書，兩人關係非常要好，這次見到大表姐，林徽因自是十分高興，並且頗為感慨。童年時代的好友，跨越長長的時間的河流再一次相聚，而時間之流已經帶走了許多她們熟識的人。

看到林徽因病中操勞的情形，大表姐很是心疼，留在北平待了半個多月，幫林徽因操持家務，陪她說話談天。這段時間，林徽因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但無時不在的病情卻在嚴重地折磨著她，讓她時時感到前途灰暗，人生苦短，有時甚至想到自己不久將辭別人世。

梁從誡說：「這幾年裡，疾病仍在無情的侵蝕著她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於自己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裡，卻又往往整晚不停的咳喘，在床上展轉呻吟，半夜裡一次次的吃藥、喝水、咳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她是那樣的孤單和失望，有著難以訴說的淒苦。往往越是這樣，她白天就越是顯得興奮，似乎想要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

在這樣的情況下，林徽因把種種心緒都傾寫到自己的詩，如〈寫給我的大姊〉：

當我去了，還有沒說完的話，
好像客人去後杯裡留下的茶；

說的時候，同喝的機會，都已錯過，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點感傷，你把臉掉向窗外，
落日將盡時，西天上，總還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戀算不得罪過，
將盡未盡的哀曲也是常情。
你原諒我有一堆心緒上的閃躲，
黃昏時承認的，否認等不到天明；——
有些話自己也還不曾說透，
他人的瞭解是來自直覺的會心。

當我去了，還有沒說完的話，
像鐘敲過後，時間在懸空裡暫掛，
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繼續；
對忽然的終止，你有理由懼怕。
但原諒吧，我的話語永遠不能完全，
亙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啞。

這首詩感傷的語氣讓人讀後黯然傷神，還有太多的話沒有說，太多的事沒有做，生命卻要「忽然的中止」，怎不讓人傷懷？這真是「笑靨如花，怎奈枝頭飄零」！

又如〈惡劣的心情〉一詩，描述林徽因受病痛折磨產生的苦悶心境：

我病中，這樣纏住憂慮和煩擾，
好像西北冷風，從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如黃昏街頭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瑣屑裡尋討安慰，
自己在萬物消耗以後的殘骸中驚駭，

又一點一點給別人揚起可怕的塵埃！

吹散記憶正如陳舊的報紙飄在各處的彷徨，
破碎支離的記錄只顛倒提示過去的騷亂。
多餘的理性還像一隻極餓的野狗
那樣追著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著
咬嚼人類的感傷；生活是什麼都還說不上來，
擺在眼前的已是這許多渣滓！

我希望；風停了；今晚情緒能像一場小雪，
沉默的白色輕輕降落到地上；
雪花每片對自己和他人帶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層一層把惡劣殘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麗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暫不必再有，——
絕望要來時，索性是雪後殘酷的寒流！

時代環境的惡劣，無休無止的病痛……諸多的原因讓林徽因感到心灰意冷，難以忍受，她甚至想，還不如來個徹底，「索性是雪後殘酷的寒流」。

再如〈六點鐘在下午〉詩中所透露在病痛中的無奈和絕望：

用什麼來點綴
六點鐘在下午？
六點鐘在下午
點綴在你生命中，
僅有彷彿的燈光，
褪敗的夕陽，窗外
一張落葉在旋轉！

用什麼來陪伴
六點鐘在下午？
六點鐘在下午
陪伴著你在暮色裡閒坐，
等光走了，影子變換，
一隻煙，為小雨點
繼續著，無所盼望！

這時，林徽因的病情的確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她的肺病已經到了晚期，而且一個腎已經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醫生診斷，必須做手術切除掉被感染的腎，才有可能保住生命。但為了保證手術成功，病人必須在手術前精心休養，使身體達到較好的狀態，能夠承受手術帶來的損耗。

林徽因給梁思成發電報，把情況告訴他。收到電報時，梁思成已經在美國待了七個月，剛結束在耶魯大學的講學，並接受了該校的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他還參加了設計聯合國大廈建築師顧問團的工作，考察了美國近二十年來的城市建築，結識了一批現代建築的權威人物。此外，他也把在李莊完成的《中國建築史圖錄》作了修改，委託費慰梅聯繫出版社出版。梁思成的建築事業在迅速發展著，這對一位學者來說，是真正的黃金時期，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如大洋彼岸家中妻子的生命要緊。梁思成馬上處理手邊各種事情，立即趕回國內。見到林徽因時，她仍在發低燒，無法動手術，梁思成則一邊忙著處理各種工作上的事情，一邊盡可能地抽出時間來陪林徽因，再度扮演護士、知己和安慰者的角色。

過了不久，梁思成在美國為朋友們買的禮物運到了北京。林徽因本來期望能拿到一些精緻的服裝、五顏六色的布料和漂亮的小擺設來答謝熱心的親友的幫助，卻驚訝地發現梁思成買的多半是美國的電子小玩意，用來安慰和豐富她的床上生活，林徽

因非常幽默地描繪道：「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他帶回的那些可以徹底拆、拼、裝、卸的技術裝備。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調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著可以調節的讀寫小桌，外加一台經過插入普通電源的變壓器的錄音機，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話筒，一副無憂無慮的現代女郎的架勢，頗像卓別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機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大家一致讚揚梁思成買的那輛小型克勞斯萊牌汽車，對於林徽因來說，那不啻於上天的禮物。現在她可以乘坐著這輛小汽車去看朋友或用它接朋友來玩了。這在以前，簡直是無法想像的。

秋涼的時候，林徽因的身體有所好轉，醫生決定看看她的身體能不能動手術，給她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這年的十月四日，林徽因在病房中給費慰梅寫信說：

我應當告訴你我為什麼到醫院來。別緊張。我只是來做個全面體檢。作一點小修小補——用我們建築術語來說，也許只是補幾處漏頂和裝幾扇紗窗。昨天下午，一整隊實習和住院大夫來徹底檢查我的病歷，就像研究兩次大戰史一樣。我們（就像費正清常做的那樣）擬定了一個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齒、肺、腎、飲食、娛樂和哲學建立了不同的分委員會。鉅細無遺，就像探討今日世界形勢的那些大型會議一樣，得出了一大堆結論。同時許多事情也在著手進行，看看都是些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用上了所有的現代手段和技術知識。如果結核菌現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這就是其邏輯。

……這醫院是民國初年建的一座漂亮建設：一座「袁世凱式」、由外國承包商蓋的德國巴羅克式四層樓房！我的兩扇

朝南的狹長前窗正對著前庭，可以想像1901年時那些汽車、馬車和民初的中國權貴們怎樣裝點著那水泥鋪成的巴羅克式的台階和通道。

直到十二月，林徽因才做了手術，這中間的兩個多月是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的。有時會有短暫的發燒，要做進一步的檢查，有時又有輸血帶來的併發症，最後還得等醫院來暖氣。手術前，林徽因為了以防萬一，不能再見到朋友，也不能再給他們寫信，她給費慰梅寫了一封訣別信。她說，「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多好。」

手術非常成功，不久林徽因搬回家中溫暖舒適的臥房中休養，她戲稱她的臥房「隔音又隔友」。到了二月中旬，林徽因已經擺脫了手術後的發燒，身體逐漸康復起來，梁思成說：「她的精神活動也和體力一起恢復了，我這個護士可不高興這一點。她忽然詩興大發，最近還從舊稿堆裡翻出幾首以前寫的詩，寄到各家雜誌和報紙的副刊去。幾天之內寄出了十六首！一如以往，這些詩都寫得非常好。」老金說：「問題是她不甘寂寞。她倒不要別人取悅她，只是閒不住。」

這是林徽因的特點。不管條件多麼艱苦和惡劣，只要還允許她動腦思考，動筆寫字，她就要表達自己，讓內心不絕的智慧的泉水汨汨流出。充沛的精力、活躍的思維和敏銳的感受力，加上對生活無比的熱愛，讓她像一顆明珠一樣，無時無刻不放射出驚人的璀璨、奪目的光輝。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渥太華結婚二十週年紀念日，幾位好朋友到他們家祝賀。讓人驚訝的是，林徽因即席做了一場關於宋朝都城的演講。養病期間，她也沒有忘

記讀書、研究。這讓在場的老金為「新郎新娘」有些擔心，林徽因的傷口曾裂開差不多兩三厘米，梁思成很瘦，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華擔任繁重的課程，「每天的生活就像電話總機一樣——這麼多條線都在他身上相交」。

這一年，一位年輕的朋友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她就是梁思成的續絃林洙。林洙後來回憶說：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結束了中學生活，考上了私立的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可是當時私立大學的學費相當昂貴，我的哥哥已經在一個私立大學就讀，如果我再上私立大學，對我們這樣公職人員的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幾乎是難以負擔的。

恰巧，這時我的男朋友程應鈞要北上到清華大學建築系任教。我父親決定讓我和哥哥都隨程北上求學。他聽說清華設有先修班，因此寫信給清華的同鄉林徽因，請她幫助我進入清華的先修班。……

我到清華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去拜訪林徽因。但我聽到一個壞消息，她不久前剛剛做了腎切除手術，肺部結核也已到了晚期，醫生告訴梁思成說她將不久於人世了。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多麼悲哀的事，我反覆地考慮著去不去拜見她。我不斷聽到人們對她超人才智的讚揚，及對他們夫婦淵博的學問的敬佩。我就更害怕了，我這個沒有被清華錄取的小青年，在她的面前將多麼尷尬，我一直拖延著去拜見她的日期，直到她聽到我已到清華的消息，召見我時，我才去見她。

在一個初秋的早上，陽光燦爛，微風和煦，我來到清華的

教師住宅區新林院八號梁家的門口，輕輕地叩了幾下門。開門的劉媽把我引到一間古色古香的起居室，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北半部作為餐廳，南半部為起居室。靠窗放一個大沙發，在屋中間放一組小沙發。靠西牆有一個矮書櫃，上面擺著幾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還有一個白色的小陶豬及馬頭。傢俱都是舊的，但窗簾和沙發面料卻很特別，是用織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來很厚，質感很強。在窗簾的一角綴有咖啡色的圖案，沙發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鋪著繡有黑線挑花的白土布，但也是舊的，我一眼就看出這些刺繡出自雲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過某些達官貴人的宅第，見過豪華精美的陳設。但是像這個客廳這樣樸素而高雅的佈置，我卻從來沒有見過。

我的注意力被書架上的一張老照片吸引住了，那是林徽因和她父親的合影。看上去林先生當時只有十五六歲。啊！我終於見到了這位美人。我不想用細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雙眼皮，長睫毛，高鼻梁，含笑的嘴，瓜子臉……這樣的詞彙來形容她。不能，在我可憐的詞彙中找不出可以形容她的字眼，她給人的是一個完整的美感。是她的神，而不是貌，是她那雙凝視著的眼睛裡，深深蘊藏著的美。當我正在注視這張照片時，只聽見臥室的門「嗒」地一聲開了。我回轉身來，見到林先生略帶咳嗽微笑著走進來，她邊和我握手邊說：

「對不起，早上總是要咳這麼一大陣子，等到喘息稍定才能見人，否則見不得人的。」

她後面一句話說得自然詼諧，使我緊張的心弦頓時鬆了下來。後來我才知道，她這句話包含著她這一輩子所受病痛

的折磨與苦難。我定睛看著她。天哪！我再也沒有見過比她更瘦的人了。這是和那張照片完全不同的一個人，她那双深深陷入眼窩中的雙眼，放射著奇異的光彩，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抓住。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羊絨衫，白襯衫的領子隨意地扣在毛衣內，襯衫的袖口也是很隨意地翻捲在毛衣外面。一條米色的褲子，腳上穿一雙駝色的絨便鞋。我們都坐下後，她就開始問我報考大學的情況。這是最怕的事，只得羞怯怯地告訴她，我自認為數學、化學、語文尚好對付，物理、地理不行，最頭疼的是英語。我對它簡直一籌莫展。她笑了笑說：

「你和我們家的孩子相反，再冰、從誠他們都是怕數學，你為什麼怕英語。」

「我怕文法，」我說，「我簡直搞不清那些文法。」

「英語並不可怕，再冰中學時在同濟附中，學的是德語，英語是在家裡學的，我只用了一個暑假來教她。學英語就是要多背，不必去管什麼文法。一個假期我只選了一本《木偶奇遇記》做她的課本，兒童讀物語法簡單，故事也吸引人，她讀一段背一段。故事讀完了英文也基本學會了，文法也就自然理解了。」

接著她又問起我的食宿情況，已經在工字廳食堂入伙。系裡的美術教師李宗津先生把他在工字廳的宿舍暫時借給我住，因為他城裡另有住房。但是工字廳是男職工宿舍，所以很不方便。她很快就想到可以讓我借住在吳柳生教授家，並說她要親自去和吳夫人商量。然後她又問我對北平有什麼印象。當我正在尋找一個恰當的詞彙來回答她時，

她已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起北京的歷史。

「北京城幾乎完全是根據《周禮》《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她說。同時她看出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便又接著解釋說：「北京城從地圖上看，是一個整齊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牆的西北角略退進一個小角外，全城佈局基本是左右對稱的。它自北向南，存在著縱貫全城的中軸線。北起鐘鼓樓，過景山，穿神武門直達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後出午門，天安門，正陽門直至永定門，全長八千米。這種全城佈局上的整體感和穩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築家和學者的無限讚歎，稱之為世界奇觀之一。」

「『左祖右社』是對皇宮而言，『左祖』指皇宮的左邊是祭祖的太廟。『右社』指宮室右邊的社稷壇（現在是中山公園）。『旁三門』是指東、西、南、北城牆的四面各有三個城門。不過北京只是南面有三個城門，東、西、北面各兩個城門。日壇在城東，月壇在城西，南面是天壇，北面是地壇。『九經九緯』，是城內南北向與東西向各有九條主要街道，而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時能並列九輛車馬即『經途九軌』。北京的街道原來是很寬的，清末以來被民房逐漸侵佔越來越狹了。所以你可以想像當年馬可波羅到了北京，就跟鄉巴佬進城一樣嚇懵了，歐洲人哪裡見過這麼偉大氣魄的城市。」我們都笑了，她接著說：

「『面朝後市』也是對皇宮而言，皇宮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機構，所以皇帝面對朝廷。『市』是指商業區，封建社會輕視工商業，因此商業區放在皇宮的後面。現在的王府井大街

是民國以後繁榮起來的。過去地安門大街鼓樓大街是北京為貴族服務的最繁華的商業區。前門外的商業區原來是在北京城外，因為遼代與金代的首都在現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當然和金的舊都有聯繫，那時從舊都來做買賣的商人，必須繞到城北的商業區去，所以乾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門外有好幾條斜街，就是人們在新舊兩城之間走出來的道路，開始在路旁搭起棚戶。慢慢地發展成為固定的建築和街道。過去一有戰爭城外的人就往城裡跑，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為了加強京城的防衛才建了外城。」她一口氣說下來，一個封建社會的宏偉的北京城地圖，在我眼前勾畫了出來。接著我們又談起頤和園，這也是我非常嚮往的地方。但是那時到頤和園沒有公共汽車，我雖然有一輛自行車，卻還不會騎，所以一直沒有去。我聽說頤和園的長廊特別有趣。林先生卻擺手說：「頤和園前山太俗氣了，頤和園的精華在後山。沈從文現在正住在諧趣園，你可以去找他，請他作嚮導。」我們談著談著，實際上是她談著我聽著，不知怎麼搞的竟過了兩三個小時。我完全忘了她是個重病人，慌忙站起身告辭。她笑笑說：「我也累了，每天下午四點我們喝茶，朋友們常來坐坐，歡迎你也來。」我從沒有和父輩的人這麼交往過，但不知怎麼的，一段意想不到的交往就這樣開始了。

我從梁家出來感到又興奮，又新鮮。我承認一個人瘦到她那樣很難說是美人，但是即使到現在我仍舊認為，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美、最有風度的女子。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充滿了美感，充滿了生命，充滿了熱情，她是語言藝術的大師，我不能想像她那瘦小的身軀怎麼能迸發出這麼強的光和熱。她的眼睛裡又怎麼能同時蘊藏著智慧，幽默，調皮，開心，機智，熱情的光澤。真的，怎能

包含這麼多的內容。當你和她接觸時，實體的林徽因便消失了，而感受到的則是她帶給你的美，和強大的生命力，她是這麼吸引我，我幾乎像戀人似地對她著迷。那天我沒有見到梁思成先生，聽說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銜去了。

從此，林洙經常到梁家，由林徽因教她學英語。每次上完課後，林徽因都邀她參加梁家的茶會，茶會多年的常客有金岳霖、張奚若夫婦、周培源夫婦和陳岱孫，以及清華大學的其他教授和建築系的老師等。林洙說：

梁家每天四點半開始喝茶，林徽因自然是茶會的中心，梁思成說話不多，他總是注意地聽著，偶爾插一句話，言語簡潔，生動詼諧。林徽因則不管談論什麼都能引人入勝，語言生動活潑。她還經常模仿一些朋友們說話，學得惟妙惟肖。她曾學朱暢中先生向學生自我介紹說：「我知唱中（朱暢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陳岱孫先生介紹我說：「這個姑娘老家福州，來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明白她是福州姑娘，還是上海小姐。」接著她學著昆明話說「嚴來特使銀南人羅（原來她是雲南人羅）」，逗得我們都笑了。

她是那麼淵博，不論談論什麼都有豐富的內容和自己獨特的見解。一天林徽因談起苗族的服裝藝術，從苗族的挑花圖案，又談到建築的裝飾花紋，她介紹我國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紋的產生、流傳，指出中國的卷草花紋來源於印度，而印度來源於亞歷山大東征。她又指著沙發上的那幾塊挑花土布說，這是她用高價向一位苗族姑娘買來的。那原來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對袖頭和褲腳。她忽然眼睛一亮，指

著靠在沙發上的梁思成說：「你看思成，她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褲腳上。」我不禁嗤嗤一笑。這時梁思成也和我們談起他在川滇調查時的趣聞。他說在雲南楚雄時，曾被作為上賓請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門上貼著一副絕妙的對聯。上聯是「握手互行平等禮」，下聯是「齊心同唱自由歌」。然後他又拖長了聲音笑著說：「橫批是『愛——的——精——誠』。」客人們全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自己也笑著說：「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和建築系的老師們往往在梁家聽了滿肚子的趣聞和各種精闢的見解與議論之後，在回家的歸途上，對梁、林兩位先生的博學與樂觀精神感慨萬分。我從沒有聽到過他們為病痛或生活上的煩惱而訴苦。

然而，林徽因的病情一天天地在加重。林洙的英語課也只好斷斷續續地進行，但只要林徽因身體稍微好一點，她就會談笑風生，以至於最後完全停止。林洙說：

一天，我們又談到北京的古建築，她問我是否都遊覽過了。我說城裡的古建築算是走馬觀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還都沒有去。她又問我最喜歡哪一處。我說，很難說，因為每一處都給我留下不同的感受。於是她熱情地為我講解分析每一處建築的藝術特點，似乎完全不理會我是個一無所知的「建築盲」。當她聽我說到天壇、故宮給我的感受，及太廟那大片的古柏給我的印象時，她突然想起了什麼，笑著問我：「聽過我和思成逛太廟的故事嗎？」

我搖搖頭。她說：「那時我才十七八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剛進太廟一會兒，

他就不見了。忽然聽到有人叫我，抬頭一看原來他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是你還是嫁給了那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了。梁先生深情地望著她，握著她的一隻手輕輕地撫弄著。他們是多麼恩愛的一對！林先生那蒼白得幾乎透明的臉，在興奮中泛起一點紅暈。我呆呆地看著他們，想起醫生對林先生病情的診斷，心中不免引起一陣酸楚。

解放前清華的教工宿舍還沒有暖氣，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個約有半人多高的大爐子才暖和。這些爐子很難伺候，煤質不好時更是易滅，對付這幾個大爐子的添煤倒爐渣等，簡直需要一個強勞力才行。那時梁再冰和梁從誠都在市內就學，這個沉重的擔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內溫度的高低冷暖，直接關係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輕易把這個工作交給別人。他則常帶著笑說：「這是粗活。」是的，他還有更重要的「細活」，每天定時為林先生注射各種藥液，他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的技術。為病人配餐，為使林先生能坐得更舒服些，給她安放各種大大小小的靠墊和墊圈。為林先生朗讀各種讀物，他是一個第一流的護士。除了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務在領導建築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學與學術研究。

一九四八年底，中國戰場上的形勢已經趨於明朗，國民黨節節敗退，共產黨乘勝追擊，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此時，林徽因收到了費正清寄來的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國和美國》，她仔細地讀了全書，並寫了一封很長的類似書評的信，對費正清的著作既有讚揚，也有批評，「就像一篇好的書評該有的那樣」。林徽因說：

現在我覺得我們大概只有一兩個月能自由地給在美國的你們寫信了，也許是因為通郵或別的什麼障礙，我覺得憋得喘不上氣、說不出話。即使是這封信，我希望它能在聖誕節前或過節時寄到。

謝謝你們寄來的書，特別是其中最後一本，費正清自己的傑作，多好的書啊！我們當然欣賞、欽佩、驚奇和進行了許多討論，大家都對這書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有時我們互相以熱情讚美的話說，費正清顯然是把握了華夏臣民的複雜心態，或知道我們對事物的不同感覺，所以這不是那種洋鬼子的玩意兒。此刻對於一個現代中國人來說，它一點也不是。張奚若熱情地說，他喜歡費正清的書，「沒有一處是外人的誤解……他懂的真不少」等等。老金說這是我們的一個「合理而科學的」總結，費正清對「有些事有著基本的理解，他和別的外國人真是不一樣」。而我和思成非常驚訝，它真的全然沒有外國人那種善意的誤解、一廂情願的期望或失望。我尤其欣賞費正清能夠在談到西方事務時使用西方詞彙，談中國事務用中國詞彙，而同一個西方語言卻既能讓美國讀者以自己的語彙來讀關於中國的事，又能讓中國讀者用另一種語彙來讀關於自己國家的事。我們對這一點都特別欣賞。

此外，我們還常常以最大的欽佩而且毫不羞恥地互相指出，有許多關於中國的事實我們竟然是從他這裡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例如，有趣的是，我從不知道玉米和白薯是這麼晚才來到中國的；還有特別是那些關於中西方關係的事件。

換句話說，我們都極為讚賞費正清的這本得意之作。自從費慰梅重建武梁祠以來，梁氏夫婦還沒有這麼高興過呢。

我唯一的遺憾，如果說有的話，是在這本總結性的著作中沒有涉及中國藝術，儘管我也看不出藝術與國際關係何干。即使如此，藝術是我們生活中那樣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要一般地談論我們的話，藝術也是不可少的，那是我們潛意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我提到藝術的時候，當然也指詩，但可能也指由我們的語言、我們特有的書法、構詞、文學和文化傳統所引發的情感和審美情趣。我們特殊的語言實際上由三部分組成：修辭、詩，只有一部分才是直截了當的語言……我想說的也許是，正是這種內涵豐富的「語言——詩——藝術的綜合」造就了我們，使我們會這樣來思索、感覺和夢想……

簡言之，我認為藝術對我們精神的塑造和飲食對我們身體的塑造一樣重要。我們吃米飯和豆腐不可避免地會使我們同那些大塊吃牛排、大杯喝牛奶，外加奶油蛋糕或餡餅的人有所不同。同樣，坐在那裡研墨，耐心地畫一幅山水畫的人，肯定和熟悉其巴爾扎克風格或後印象主義畫派和晚期馬蒂斯和畢加索，住在巴黎拉丁區的叛逆青年（或專程到墨西哥去旅行以一睹墨西哥壁畫的年輕人）全然不是一個類型……

以上全是我自己私下的一點書評——不過是為了想爭論一下，而費正清對善意的爭論總是很來勁的。寄這封信得花我一大筆錢了！

說到政治觀點，我完全同意費正清。這意味著自從上次我們在重慶爭論以來，我已經接近了他的觀點——或者說，因為兩年來每天追蹤問題的進展，我已經有所改變，而且覺得費正清是對的。我很高興能夠如此。順便說一句，因我對許多事情無知，我非常感謝費正清對中國生活、制度

和歷史中的許多方面的高瞻遠矚、富有教益的看法。因其對自己的事很熟悉，我常不願去做全面的觀察或試圖把它理清楚。所以讀費正清的書對我們極有吸引力，我們也要讓年輕一代來讀它。

在信的結尾，林徽因談到：

也許我們將很久不能見面——我們這裡事情將發生很大變化，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變化，是明年還是下個月。但只要年輕一代有有意義的事可做，過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無所謂了。

林徽因把這封信寄出之後，沒過幾天，人民解放軍的先頭部隊便解放了清華園。一個月之後，共產黨解放北京，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了。林徽因的這封信成為她寫給費正清夫婦的最後一封信。

由於天各一方，林徽因和費正清夫婦的友誼大部分是通過書信來傳遞的。在這些精美的書信中，林徽因傾訴了自己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所思所感，娓娓道來，讓人頗為感動、深受啟發，這是林徽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林徽因的生命力和才情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現，與費慰梅的互相應和，激發了林徽因的生命活力，她從一位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摯友身上，感受到了在國內友人那兒不能得到的文化上的撞擊和吸引，讓她文化生命的另一半獲得了「圓滿」。這種跨越時空的友情在多艱的歲月中給她的生命帶來了無比的溫暖，成為支撐她生活下去的重要動力。

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時間流逝，時代變遷，一代才女林徽因當年的風神我們不能得以耳聞目睹，但通過閱讀這些如同美麗

的文学作品一样的信件，仍舊可以感受到她的風致才華、她的真誠寬容、她的無與倫比的精神品質。





一九四八年底，解放軍進軍北平，國民黨軍隊負隅頑抗，企圖以北平圓明園、清華園等名勝古跡作為掩護，來遏制解放軍的進攻。

十二月十三日，解放軍在圓明園附近遭到國民黨軍隊的猛烈攻擊，住在清華園內的林徽因聽到近在咫尺的炮聲，徹夜難眠。這時，毛澤東獲悉國民黨的企圖以後，急電林彪、羅榮桓等解放軍將領：「請你們通知部隊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學校及名勝古跡。」

十五日，解放軍攻下海澱，解放清華。

十七日，毛澤東又致電林彪等人：「沙河、清河、西山系主要文化古跡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繫。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教職員聯繫，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之後沒過幾天的一個晚上，解放軍十三兵團政治部聯絡處兩位負責人在張奚若的陪同下來到梁家，他們向梁思成、林徽因說明來意：「現在部隊正為進攻北平作準備，如果與傅作義和平談判不成，那就只好攻城，但要盡可能保護名勝古跡，因而懇請梁思成、林徽因兩位先生在地圖上標出重要古建築，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以便進攻時減少損失。」

梁思成和林徽因聽了之後，非常激動，他們最近正為北平古建築會不會在戰火中被毀而憂心忡忡，焦慮不安，而現在共產黨領導人主動來聽取他們的意見，保護古建築，讓他們感到十分欣慰。他們說，這正是我們日夜擔心的事情，你們來得太好了，太感謝你們了。接著，他們把兩位負責人帶來的軍用地圖擺在桌子上，用鉛筆將有價值的古建築一一劃出。

今生第一次與共產黨的軍人直接接觸，這對視古建築為第二生命的兩人激動得熱淚盈眶，讓他們輾轉反側、寢食難安的事情終於得到了解決，梁思成和林徽因心裡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通過這件事，他們對共產黨人有了全新的認識。

十八日，解放軍第十三兵團政治部在清華大學西門張貼告示：

為佈告事，查清華大學為中國北方高級學府之一，凡我軍政民機關一切人員，均應按我黨我軍既定愛護與重視文化教育之方針，嚴加保護，不准滋擾，尚望學校當局及全體學生，照常進行教育，安心求學，維持學校秩序。特此佈告，俾眾周知！

此布

政治部主任 劉道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林徽因得知有此告示，不顧病痛在身，在女兒的攙扶下親自到西門觀看。

一九四八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林徽因、梁思成最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北平的古建築得以暫時保存。

接著，解放軍開始了解放全國的戰鬥。為了保護我國有價值的古建築和各種文化遺產，共產黨又派人來清華請教林徽因和梁思成，請他們把需要保護的古建築寫出來，以作參考。他們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在清華建築系的師生的幫助下，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便編寫出一本《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在說

明中，他們指出：「本簡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這本簡目，一九四九年六月由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圖書文物處印製，發給各路大軍，對於保護和接管全國各地的文物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年春天，林徽因和梁思成讓他們的女兒梁再冰和張奚若的女兒張文英一起參加南下工作團，對於身患重病的林徽因來說，讓女兒離開自己，參加革命工作，很可能意味著就此永別。能夠如此堅決地支持女兒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工作，顯示了林徽因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的支持和信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對於這個新時代，經歷了戰爭流亡生活的林徽因充滿了期待和熱愛。她說：「中國『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現在我們的病基本上已被我們最偉大的『醫師』治好了。新生的中國正在向康復的大道上走。」

她還說：「祖國的解放為我們全國的建築師帶來了空前的大轉變。我們不但忽然得到了設計成千上萬的住宅、工廠、學校、醫院、辦公樓的機會，我們不但在一兩年中所設計的房屋面積就可能超過過去半生所設計的房屋面積的總和乃至若干倍，最主要的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服務對象不是別人，而是勞動人民。我們是為祖國的和平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建設，也是為世界的和平建設的一部分而努力。我們集體工作的成果將是這新時代的和平民主精神的表現。」

她在介紹蘇聯作者寫的一本書中說：「作者首先告訴我們，俄羅斯人民不惟能保衛他們的祖國，而且在家鄉遭受破壞之後，能迅速地重建起來；在古代如此，在蘇維埃時代更如此。這一點與中國人民保衛祖國，重建家鄉的能力是完全相同的。在毛

澤東時代，這能力就能更全面地發揮出來。」

我們看到，林徽因作為一名同情勞動人民、愛國、把自己的一生獻給學術和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她對一個新的和平民主的時代的訴求，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政權那裡得到了實現。當她對這個新政權的領導人和參與其中的建設者們，以及他們的社會理想有所瞭解之後，她是懷著一顆熱誠的心來擁抱這個新時代的。

正是有了這種對新時代的熱愛，林徽因不顧自己的病情，擔任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主講市鎮設計課。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年裡，林徽因還為建築系的研究生開過住宅設計和建築史方面的專題講座，每當學生來訪時，林徽因就在床褥之間，「以振奮的心情為學生講解，古往今來，對比中外，謔語雄談，敏思遐想，使初學者思想頓感開擴。學生走後，常力氣不支，臥床喘息而不能言」。

儘管對新時代持熱烈的歡迎的態度，但與清華園裡許多活躍、進步、單純的年輕人相比，林徽因作為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對一些新事物、新觀點雖然也很感興趣，卻顯得更為冷靜和理智，她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知識來作出恰當的判斷。

當時，林洙經常觀看一些文工團的演出，而且常常把這些演出的內容告訴林徽因。林洙說：

她極注意地聽著，還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甚至在演出大型秧歌劇《血淚仇》時，她還準備去看，並囑我為她留一個空位子。所有的人，特別是梁公和金先生都急忙勸阻她千萬不可冒險，因為正是嚴冬季節，林先生的身體肯定受不了；但她執意要去，我只好為她留一個位子。她沒有來。

第二天梁公悄悄地告訴我說：「她從家裡出來只走了幾步路，就咳嗽喘息不止，只好乖乖地回家躺下。」當時我真不理解林先生。演出的是這麼一個無名文工團的秧歌劇，有什麼必要去冒這麼大的危險，真太不值得了。後來我才瞭解這就是林徽因：只要想知道的，她就要親自去看看；只要想做的，她就會不惜代價地努力去做。為祖國的建築、文學、藝術，一句話為祖國的文化，她從不吝惜自己。

一天，我又和林先生談到文工團的演出。我說：「把它和管夫人（喻宜萱）的演唱相比，它簡直不像音樂。但我聽了〈秋收〉和〈翻身道情〉的演唱後，的確感受到一股強大的新生的力量。」林先生說：「一個文藝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實，要忠實地反映生活。內容是占首位的，藝術形式是表現內容的手段，是第二位的。當然對於一個文化作品來說，兩者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比如某人是著名的詩人、學者。人們很尊敬他，但他寫的詩卻是：『太陽啊！快快升起來吧！』」說到這裡她格格地笑了，說「這近乎叫喊，缺乏詩歌的美，是不是？」

我說我不喜歡這詩，它太像口號了，簡直不是詩。我說我最愛沈從文和曹禺的作品。她又說：「革命文學並非天生就排斥藝術。不能因為它的革命性就用大喊大叫的政治口號來代替，歷史上各個革命時期都有優秀傑出的文學作品。你喜歡沈從文的作品，解放區有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你可以讀讀他的作品。」

在建築藝術方面，林徽因更是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應該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而且還要借鑒國外的先進思想。她說：

我們的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歷史的國家。差不多任何一個中國的市鎮都有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文物，我們有偉大優良的都市計劃傳統和建築傳統；除去幾個大都市外，全國所有的市鎮，那就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苦人民現在所正在居住的，並且所正在繼續不斷地建造的市鎮和房屋正是遵循這偉大優良的傳統建造的。但是今天中國的建築師們，無一例外地（譯者們在內）都是直接或間接由外國學來的。年長一點的由學習古希臘羅馬，文藝復興開始；年輕一輩的學習資本主義藝術理論的體形結晶，即所謂「功能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的「現代化」或「國際式」（世界主義式）流派。我們在這前後兩種毒素中酣醉了數十年。我們做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文化侵略者的幫兇，對於祖國建築傳統反不如對於歐美建築的熟諳，故也談不到熱愛，且常常帶著自卑心理的蔑視。現在我們該醒過來了。我們應該從思想根源上做一番自我檢討，……在建築工作中堅決地貫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指示給我們的新文化路線：「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

她特別強調保持建築的民族特性：「建築本來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表現之一；新中國的建築必須建築在民族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這已是今天中國大多數建築師們所承認的原則。凡是參加城市建築設計的建築師們都負有三重艱巨任務；他們必須肅清許多城市中過去半殖民地的可恥的醜惡面貌，必須恢復我們建築上的民族特性，發揚光大祖國高度藝術性的建築體系，同時又必須吸收外國的，尤其是蘇聯的先進經驗，以滿足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眾多而繁複的需求，真正地表現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的精神。」

她說：「歷史上封建的建築物雖已不能適應我們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們的優良傳統，藝術造型上的成就卻仍是我們新創造的最可寶貴的源泉。」

對於借鑒西方的建築藝術，林徽因指出：「我們借鑒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但『僅僅是借鑒而不是用它來替代』。在建築和都市計劃工作中，如同毛主席給我們在文學藝術中的指示一樣：『對於死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模仿與替代，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教條主義。』我們尤其不可頃刻忘記：建築和都市計劃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它們同時也是文化建設中極重要而最顯著的一部分，他們都必須在民族優良的傳統上發展起來。」

在實際工作中，林徽因實踐了自己的觀點。一九五一年，她與梁思成一起把蘇聯N.沃羅寧的《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翻譯成中文出版，以作為百廢待興的國家建設的參考。此外，林徽因把她生命最後的精力投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上。



豐碑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公開在報刊上徵求國旗、國徽圖案以及國歌詞譜，梁思成擔任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顧問。

顯然，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情，舉國上下，眾多人士都貢獻了自己的熱情和才智。很快地，國旗圖案和國歌詞譜確定下來，即五星紅旗和《義勇軍進行曲》，但國徽圖案雖然收到了九百多份，卻沒有一種被選中。在這種情況下，籌委會決定由清華大學和中央美院來承擔這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又通過了建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提案，並通過了碑文。這天傍晚，毛澤東主席和全體代表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紀念碑破土奠基典禮，接著，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向全國徵求紀念碑設計方案。

這兩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林徽因抱著病體皆參加了，且非常熱心，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她的建築事業也由此達到了頂峰。

為了圓滿完成任務，清華大學專門成立了國徽設計小組，由梁思成、林徽因負責，成員有莫宗江、朱暢中、羅哲文、李宗津、張昌齡、汪國瑜等人。

一天，梁思成從政協籌委會國旗國徽評委會上，帶回來了一本國徽圖案參考資料，這是從上千件應徵的作品中挑選出來的，梁思成把資料一張張攤在桌子上，大家興奮地討論起來。這些圖案，有的明顯地在模仿外國的國徽，有的花花綠綠，很不莊嚴。其中有一張，右上角畫了一個光芒四射的紅太陽，下面是藍色的大海，有兩隻海鷗在展翅飛翔，林徽因看了一眼說：「天哪！這簡直就是陰丹士林布的商標。」朱暢中接著說：「七折大

拍賣。」大家都笑了起來。工作開始忙碌起來，林徽因跟設計組的成員一起討論比較各國的國徽的優點，以及不同國家的國徽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林徽因還找出一些古代的銅鏡、玉環等工藝美術作品作為參考資料，用來啟發靈感。

梁思成轉達了國徽審查小組要求在國徽圖案中要有天安門的圖像的意見，並強調國徽作為一個國家的標誌，必須莊嚴大方，不能像風景畫，更不能像商標，容不得半點庸俗和輕浮。林徽因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想，並立刻派朱暢中去畫天安門的透視圖。她認為，國徽應該放棄多色彩的圖案結構，採用中國人民千百年來所喜愛的金紅兩色，這種中國自古以來用來象徵吉祥的顏色，用之於國徽的基本色，使國徽顯得富麗堂皇、莊嚴壯麗，完美地體現了我們的民族特色。

清華國徽設計小組一共設計了二十、三十個正式完成的國徽圖案，送交審查小組和國家領導人審閱。

到了六月，經過三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反覆思考、討論、修改，一枚定型的國徽圖案終於設計出來了，但由於過度勞累，定案的那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都病倒了，便讓兼任秘書工作的朱暢中前去送審。

在評審過程中，周恩來總理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他建議把麥穗設計得挺拔一點，以顯示昂揚奮進的精神。

第二天，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立即討論周總理的改進意見，大家非常振奮，只用了兩、三天的時間，便把修改後的做好了，重新畫了一幅很大的國徽圖案，在圖紙上首，林徽因用紅紙剪了「國徽」兩個字，在圖的下方寫了「國徽圖案說明」：「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徵中國人民自「五四」

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以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林徽因作為國徽的設計者被特邀參加。會上，在毛主席的提議下，全體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過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並設計的國徽圖案。當全體代表起立鼓掌時，林徽因用手按著座椅的把手才勉強地站了起來，激動得熱淚盈眶。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出了公佈國徽圖案的主席令：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會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業經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會議通過，特公佈之。

此令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國徽圖案設計成功，耗費了林徽因大量的心血。林洙回憶說：「我每次去梁家都看到屋子裡鋪天蓋地擺滿圖紙。林徽因半臥在床上，俯在一個特製的能在床上用的小几上畫圖。累了就往後一躺。」梁從誠回憶說：「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想都是她首先提出並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著圖板，扶病乘車到中南海，向政府領導人匯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可以說，設計國徽是林徽因晚年最輝煌的創造，她用生命為自己的事業譜寫了最華美的樂章。」

關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梁思成是主要的負責人。他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關於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問題致彭真的信中說：「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佔地點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對國家和人民無限的忠心，對英雄們無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浹背戰戰兢兢的要它千妥萬貼才敢喘氣放膽做去。」經過反覆的思考、修改，梁思成最後設計出一份建築方案，提交後，獲得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的通過。

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圖案，林徽因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她給梁思成的信中寫道：「我的工作現實限制在碑建會設計小組的問題，有時是把幾個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組織一下分配一下工作，技術方面討論如雲紋，如碑的頂部；有時是討論如何集體向上級反映一些具體意見作一兩種重要建議，今天就是剛開了一次會有阮邱莫吳梁連我六人，前天已開過一次，擬了一信稿呈鄭副主任和薛秘書長的，今天阮將所擬稿帶來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簽名明天可發出（主要要求一、立即通知施工組停札鋼筋），美工組合組事雖定了尚未開始所以二、也趁此時再要求增加技術人員加強設計實力三、反映我們對去掉大台認為對設計有利，可能將塑型改善，而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確單純得多。」

同時，林徽因還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以及底座上的花圈。她整整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詳細地比較世界各地的花草圖案，畫了幾百幅不同風格的草圖，最後選定了以橄欖為主體的花環設計，並採用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花作為高貴、純潔和堅韌的象徵。今天我們看到的紀念碑上的花環，凝聚了林徽因巨大的心血。

此外，林徽因還為搶救民族工藝景泰藍花費了大量心血，多年

之後，當林洙看著書桌上林徽因設計的兩個精美的景泰藍小罐時，回憶往事，思緒萬千。她說：

我久久地凝視著它，我的眼前呈現出林徽因因為恢復瀕於停產的景泰藍手藝，嘔心瀝血的日日夜夜。如果編寫《中外歷史之謎》的作者，知道林徽因晚年的健康情況，一定會寫一條「林徽因健康之謎」編入書中。醫生們一次又一次地發出病危的「黃牌」警告，都被她闔了過來。她不但活了下來，而且是怎樣地活啊！她的肺已佈滿了空洞，腎也切除了一側，結核菌已從肺到腎，到腸。她一天吃不了二兩飯，睡眠不到四五個小時，但卻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帶著她的助手莫宗江、常沙娜等人，多次跑到景泰藍工廠去調查，瞭解它的工藝程序及材料特點。她很快就得出結論：工人師傅的手藝是高超的，但是由於傳統產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單一，圖案繁瑣，致使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瀕於停業。於是她又以驚人的毅力和她的助手們一起研究設計出適合景泰藍生產工藝的造型與圖案及配色。為了探索和發展民族傳統的優良圖案，她對我國歷代圖案進行了研究。她已不能像設計國徽時那樣親自畫圖了，她的意圖常常是由她最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來完成。我不止一次在林先生處看到莫宗江畫的工筆圖案，那真是一張張極美的藝術品。

她如願以償了。當蘇聯著名芭蕾舞演員為蘭諾娃接過林徽因設計的景泰藍禮品時，高興地說：「這是代表新中國的禮品，真是美極了！」

景泰藍現在已被認為是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而立於世界手工藝品之林。有朝一日人們也許會專為北京景

泰蘆寫一本書，但是人們會不會記得有一個被結核病苦苦折磨的弱女子，為它獻出了自己最後的心血。

我這樣寫，請不要以為林徽因是個整天痛苦地哼唧唧緊鎖眉頭工作的人。啊不！她永遠快樂，任何美的東西都能使她興奮和愉快。為了景泰藍，她常跑到最基層的作坊去，並以此為樂。

有一次她與我們談瓷器的造型，就談起在昆明時她曾為了想要一個好看的陶罐，親自跑到郊外一個陶罐的作坊去。「你們知道嗎？燒窯和制坯過去是傳子不傳女的。而且婦女是不許進作坊的。」她說，「我好不容易花了大價錢才買通這一關，進作坊以前還要對祖師牌位磕頭。制坯師傅的那一雙手呀！真了不起！他把坯泥放在一個轉盤上，用腳踩來控制轉動。兩手不停地上下捋著塑型。」她越說越興奮，雙手學著師傅的動作，往下說。

「多少次出現了優美的造型；我在一旁求他『停下來，停下來，就要這個。』但是那師傅半閉著眼，臉上毫無表情，根本不理睬我。他的手仍在不停地動作。」她像演員一般模仿著師傅的表情和動作。

「我不知道他要什麼？那些優美的造型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我抱的希望也越來越大。」於是她滿臉淘氣地說：「最後只見他的手從下往上快速而熟練地一捋，這才停了下來，露出笑容得意地看著我。啊！原來是一個痰桶！」我們都忍不住大笑了起來。林徽因是快樂的，和她在一起也永遠是快樂的。當然最快樂的是梁思成。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幾年緊張的實際工作中，林徽因也沒有放鬆過在古建築方面的學術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她和梁思成、莫宗江一起，將他們多年來對中國建築史的基本觀點，做了一次全面的檢討，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一篇長文。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著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重新回顧從遠古時代到現代中國建築的發展歷程，並以此為他們的研究工作探求一個更加科學的理論基礎。

林徽因在建築和美術方面的治學態度十分嚴謹，對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細緻嚴格，而決沒有那種大而化之的「顧問」作風。一九五三年前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林徽因審稿並作序，林徽因對其中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批評，其最後幾段如下：「青線的變調和各彩色在應用改動的結果，在全梁彩色組合上，把主要的對比攪亂了。例如將那天你社留給我的那張印好的彩畫樣子和清宮中太和門中樑上彩畫（庚子年日軍侵入北京時由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專家所測繪的一圖），詳細核對，比著一起看時，就很明顯。原來的構圖是以較黯的青線為兩端箍頭藻頭的主調來襯托第一條梁中段以朱為地，以彩色「吉祥草」為紋樣的枋心，和第二條梁靠近枋心的左右梁，紅地吉祥草的兩段藻頭。兩層梁架上就只點出三塊紅色的主題，當中再隔開一道長而細的紅色墊板，全梁青線和朱的對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亂。」

除此之外，在五〇年代初，林徽因還試圖用英文為漢武帝寫一個傳，而且已經開了頭，但最終沒有完成。由於林徽因為新中國作出的傑出貢獻，她被先後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對於在新的時代中如何認識自己，確定自己的人生坐標，林徽因說：「我連著看了四

本書都是小說式傳記。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一)是〈建設伏爾加——頓河運河的人們〉，短篇的，幾篇都好；(二)是〈普通一兵〉記馬特洛索夫的事跡；(三)是〈斯特漢諾夫工人階級筆記〉；(四)是〈安格林娜自傳〉(第一個女拖拉機手)。這些人和事都深深地深深地教育了我，提高了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瞭解和感性認識，不只是一種理論在我腦子裡，而是形象化了的事實。這些精神養料太豐富了，現在只是它們如何結合到我生活中來的問題了。這樣的熏陶下去，新意識和新意志必會在我血液裡產生出來的。我也會蛻變成為新時代裡的最可靠的人，穩穩當當，踏踏實實地不斷做好工作。通過可靠的勞動得到結實的進步。也許就因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會成為有價值的人。一反過去那樣想做有價值的事，反而是無價值、無成績的人。」

一九五〇年，林徽因被任命為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為了保護和研究北京的古建築，五〇年代初，林徽因先後在《新觀察》發表了〈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以及〈中山堂〉、〈北海公園〉、〈天壇〉、〈頤和園〉、〈雍和宮〉、〈故宮〉等一組介紹北京古建築的文章。她說：「從來沒有經過專家或學術團體做過有系統的全面調查研究；現在北京的文物還如同荒山叢林一樣等待著我們去開發。」對於北京大量的建築古跡，林徽因通過查閱資料，精心梳理，對它們的歷史沿革做了準確論述，對它們的現狀做了生動的描繪。對於頤和園，她說：

北京西郊的頤和園，在著名的圓明園被帝國主義侵略軍隊毀了以後，是中國四千年封建歷史裡保存到今天的最後的一個大「御苑」。頤和園周圍十三華里，園內有山有湖。倚山臨湖的建築單位大小數百，最有名的長廊，東西就長達一千幾百尺，共計二百七十三間。

頤和園的湖、山基礎，是經過金、元、明三朝所建設的。清朝規模最大的修建開始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當時本名清漪園，山名萬壽，湖名昆明。一八六〇年，清漪園和圓明園同遭英法聯軍毒辣的破壞。前山和西部大半被毀，只有山巔琉璃磚造的建築和「銅亭」得免。

她這樣描寫北海：「北京城中，會有像北海這樣一處水闊天空，風景如畫的環境，據在城市的心臟地帶，實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驚喜。初次走過橫亙在北海和中海之間的金鑾玉蟲東橋的時候，望見隔水的景物，真像一幅畫面，給人的印象尤為深刻。聳立在水心的瓊華島，山巔白塔，林間樓台，受晨光或夕陽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湖岸石橋上的遊人或水面小船，處處也都像在畫中。池沼園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藉以調節氣候，美化環境，休息精神；北海風景區對全市人民的健康所起的作用是无法衡量的。」此外，還描寫了天壇：「天壇在北京外城正中線的東邊，佔地差不多四千畝，圍繞著有兩重紅色圍牆。牆內茂密參天的老柏樹，遠望是一片蒼鬱的綠蔭。由這樹林中高高聳出深藍色傘形的琉璃瓦頂，它是三重簷子的圓形大殿的上部，尖端上閃耀著塗金寶頂。這是祖國一個特殊的建築物，世界聞名的天壇祈年殿。」

可以說，林徽因對這些建築古跡傾注了無比的心血，愛惜它們勝過了自己的身體。

對於古建築的研究、保護是她和梁思成關注的一方面，作為北京市遠景規劃的參與者，他們又以極大的熱情，為理想的現代化首都的規劃設計殫精竭慮。然而，這是一場徒勞的努力。梁從誠說：

對於北京的規劃，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北京是一座有著八百多年歷史，而近五百年來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

文化古城，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北京的原貌本身就是歷代勞動人民留給我們的無價珍寶。而它又是一座「活的」的城市，現代人仍然生活於其中，仍在使用和發展著它，但現代人只負有維護古都原貌，使之傳諸久遠的義務，而沒有「除舊布新」，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貴古跡易容湮滅的權利。第二，他們認為，原北京城的整個佈局，是作為封建帝都，為滿足當時那樣的需要而安排的，它當然不能滿足一個現代國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而如果只著眼於對舊城的改建，也難以成功。他們根據國外許多歷史名城被毀的教訓，預見到如果對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現代高層建築硬塞進這古城的框框，勉強使它適應現代首都的需要，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現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滿足，古城也將面目全非，弄得不倫不類，其弊端不勝枚舉。然而，這些意見卻遭到了來自上面的批駁。於是，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國外那些古城的命運。

那些「妨礙」著現代建設的古老建築物，一座座被剷除了，一處處富有民族特色的優美的王府和充滿北京風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現代建築，又「中心開花」地在古城巾冒了出來。繼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鑾玉蠡東」橋等等被拆除之後，推土機又兵臨「城」下，五百年古城牆，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背景象徵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母親幾乎急瘋了。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她和父親深知，這城牆一旦被毀，就永遠不能恢復，於是再三懇請下命令的人高抬貴手，刀下留城，從長計議。

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城牆是封建帝王鎮壓人民對抗

農民起義的象徵，是『套在社會主義首都脖子上』的一條『鎖鏈』，一定要推倒！又有人動員三輪車（如此落後的交通工具！）工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控訴』城門、牌樓等等如何阻礙交通、釀成車禍，說什麼『城牆欠下了血債！』於是母親和父親又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多開城門的設想，建議在環城近四十公里的寬闊城牆上面種花植草，放置涼棚長椅，利用城門樓開辦展覽廳、閱覽室、冷飲店，為市區居民開闢一個文化休息的好去處，變『廢』為利。然而，據理的爭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於事。」

母親曾在絕望中問道：「為什麼經歷了幾百年滄桑，解放前夕還能從炮口下搶救出來的稀世古城，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反而要被毀棄呢？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那麼精心地保存起幾塊出土的殘磚碎瓦，同時卻要親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這處雄偉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說起母親和父親對待古建築的立場，我便不能不提到對於「大屋頂」的批判問題，這個批判運動雖然是在母親去世之後，針對父親的建築思想開展的，但這種建築思想歷來是他們所共有的，而且那批判的端倪也早已見於解放之初。這表面上雖是由經濟問題引出來的，但實質上卻是新中國的建築要不要繼承民族傳統，創造出現代的民族形式的問題。對於這個重大課題，母親和父親出於他們自幼就懷有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早在留學期間便開始探索。他們始終認為，現代建築的材料與結構原理，完全可能與中國古代建築的傳統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富有中國氣派的民族風格。他們經過反覆思考，明確

否定了幾十年來風行於世界各地的「玻璃盒子」式，或所謂「國際式」的建築，認為它們抹殺了一切民族特徵，把所有的城市變得千城一面；他們也反對復古主義，反對造「假古董」。

早在三〇年代初母親在為《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中就已經告誡建築家們「雖須要明瞭過去的傳統規矩，卻不要盲從則例，束縛自己的創造力」。但是在民生凋敝的舊中國，他們一直缺乏實踐機會。這方面的摸索，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有可能開始。母親確曾說過，屋頂是中國建築最具有特色的部分，但他們並沒有把民族形式簡單地歸結為「大屋頂」。

五〇年代前期各地出現的建「大屋頂」之風，是對民族形式的一種簡單的模式化理解，或者說是一種誤解或曲解，決不符合父親和母親的真正主張。而且當時那種一哄而起，到處蓋房子都要搞個大屋頂的做法，正是四十多年來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屢見不鮮的一哄而起和攀比作風的早期表現，是不能完全由父親和母親這樣的學者來負責的。五〇年代前期，在追求所謂「民族形式」的浪潮中出現的不少建築，的確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建築藝術上都很難說是成功的，然而當時那些不由分說的批判，確實曾深深地傷害了他們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的，科學上和藝術上的探索精神，把他們終身遵循的學術信念和審美原則一下子說得一錢不值，大謬不然，這不能不使他們（母親去世後，主要是父親）感到極大的惶然。

繼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對「大屋頂」的批判，在以簡單粗暴方式對待學術思想問題方面，也在知識界中開

了一個極壞的先例。母親去世很早，沒有來得及看到在批判「大屋頂」的同時北京冒出來的那一批俄羅斯式的「尖屋頂」，更沒有看到後來會有這麼多他們所最惱火的「國際式」高層玻璃盒子，有些上面還頂著個會轉圈的「罐頭盒屋頂」，以「鐸未殘」之勢，刺破蒼碧空下古城原有的和諧的建築天際線；也沒有看到在被拆毀的古城牆遺址邊上，又長出了那麼一排排玻璃與水泥構築的灰黯的「新式城牆」，否則，她定會覺得自己作為建築家而未能盡到對歷史的責任，那種痛苦我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古城牆以及其他重要古跡的被毀，對重病中的林徽因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打擊。這不只是毀滅了大批的珍貴古建築，造成了文化上的巨大損失，而且直接挫傷了林徽因對新的建設事業的積極性，以及對自己的事業、對社會發展的熱切期望，當這根支柱被擊垮時，林徽因的生命之火逐漸地減弱了。對於林徽因在建國之後之所以以如此巨大的熱情來參加工作，梁從誠做了很好的解釋。他說：

解放了。

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態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對於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瞭解。只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討論著、籌劃著……。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於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於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別是請他們參加並指導北京市的規劃工作。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

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蹟般地到來了。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通通加以實現。只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因為新社會確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她始終只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是以自己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產生感激之情。「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從一九五四年秋天開始，林徽因停止了一切工作。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著、喘著，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雖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一九五四年底，林徽因住進了同仁醫院。在她住院後不久，即一九五五年一月，梁思成也因肺病入此醫院治療，而且就住在林徽因病房隔壁房間裡。當梁思成精神稍好後，每天總是到林徽因房中陪伴她。

到三月底，林徽因一直發著高燒，精神昏迷。醫院組織了最有經驗、水準最高的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進行治療。可是，她的肺部已經大面積感染，身體極端虛弱，生命之火已經燃燒到盡頭。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處於彌留狀態的林徽因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一位護士說：「我要見見梁思成。」護士卻說：「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四月一日晨六時二十分，林徽因來不及跟梁思成作最後的訣別，心臟便停止了跳動，悄然地離開了人世，終年五十一歲。

四月二日，《北京日報》刊登了訃告，由張奚若、周培源、錢端升、錢偉長、金岳霖等十三人組成治喪委員會，在金魚胡同賢良寺舉行了追悼會。親友們送來了許多花圈和輓聯。其中最為醒目的一副輓聯是她的兩位幾十年的摯友——哲學家金岳霖和鄧以甄聯名寫的：

一生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林徽因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作她的墓碑，墓體則由梁思成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